

少年中國

第四卷

(第一—十二期)

少年中國

第 四 卷

(第一——十二期)

影 印 者 说 明

《少年中国》月刊，由北京少年中国学会总会负责编辑，于一九一九年七月一日创刊，一九二四年五月停刊，共出四卷（每卷十二期）。

这次影印仍按原版第一至四卷装订出版。

少年中国

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影印

新华书店内部发行 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本卷定价 25.80 元

* 少 * 年 * 中 * 國 * 學 * 會 * 叢 * 書 *

人 心

"Notre Cœur"

著 者

莫泊桑 Guy de Maupassant

李劫人譯黃仲蘇校

全一冊價一元二角

羅蜜歐與朱麗葉

"Romeo and Juliet"

著 者

莎士比亞 William Shakespeare

一田漢譯「莎翁傑作集」第二種

全一冊印刷中

小 物 件

"Le petit Chose."

著 者

都德 Alphonse Daudet

李劫人譯黃仲蘇校

全一冊一元二角

古 動 物 學

"Conférences de Paléontologie"

著 者

補勒教授 M. Boule

周太玄譯

全一冊價八角

哈 孟 雷 特

"HAMLET."

著 者

莎士比亞 William Shakespeare

一田漢譯「莎翁傑作集」第一種

全一冊價五角

法 國 文 學 史

一自十八世紀至今日一

[插入文學者肖像二十一幅]

李璣編

全一冊價一元二角

沙 樂 美

"Salomé"

著 者

王爾德 Oscar Wilde

田漢譯, Beardsley 畫。

全一冊價六角

人 的 研 究

"Personnalité biologique de L'homme"

[插圖六十幅]

佛利野德博士 Jean Friedel 著

周太玄譯

全一冊印刷中

嘉 爾 蠻

"Carmen"

著 者

梅禮美 Prosper Mérimé

田漢譯 René Bull 畫

全一冊印刷中

經 濟 學 要 旨

"Premières

Notions d'Economie Politique"

季特教授 Charles Gide 著

李璣譯

全一冊印刷中

上 海
棋盤街中市

中 華 書 局 有 限 公 司

分 發 行 所
各 省 分 局

少年中國

“THE YOUNG CHINA”

第 四 卷
第 一 期

民國十二年三月

每期一角五分
全年一元五角

— 要 目 —

- 社會主義與個人 李 璜
- 我們的工作 王光祈
- 法蘭西民族之天才與其前途 周太玄
- 詩人微尼評傳 黃仲蘇
- 江戶之春 田 漢
- 羅蜜歐與朱麗葉 田漢譯
- 會員通信 方東美, 李 璜
- 附錄

少年中國學會出版

上海中華書局有限公司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分售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社會主義與個人

李 璜

我在少年中國月刊第三卷第十期發表了那篇「社會主義與社會」的文字以後，接着家鄉裏一個老同學的信；這個同學算是我素所敬服的，他對於國家運命的前途也算得一個有心的人。他的信說道：

“……數年以來，政爭兵禍，無有寧時，民生凋敝達於極點；乃聞二三有志之士有馬克斯社會主義之主張，欲以多數平民之力合抗武人，取得政權，國脈民生將共賴於此舉。弟對於馬克斯之說素無研究，閱北京上海雜誌報紙，漸有人攻擊其說之謬，謂不宜於現代之中國。今閱足下在少年中國上所發表之「社會主義與社會」亦覺有中國不宜遽行馬氏之說之意。不知除馬氏學說外，尚有較宜實行於中國之社會主義否？貴學會現正研究，必有所得以爲世倡。弟亦有心着手研究，足下能爲我介紹一二本簡明之經濟學或社會主義譯本則非常感謝。……”

我復他的信的大意是：

“……弟所發表文字非欲攻馬克斯社會主義之短，乃欲與同人真正的盡研究社會主義的責任。因既欲實行一種前人的學說，則與自出心裁不同，必先力求了解，然後庶免自欺欺人之誚。國中主張共產主義者雖不乏曾經研究之人，但大半以感情用事或利用主義者居多；其主張最激烈者，即是最不了解其所主張之妄人。動曰滅產，曰廢國，彼實不知產爲何物，國爲何事。知之，必不言之如此其易也。……馬克斯之說所以能顛撲不破者在其唯物史觀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但學者已病其忽略精神與個人創造方面。今所謂新馬克斯共產主義 (Communisme néo-

marxisme)，其唯一得意之作便是「狄克推多」，盡棄馬克斯唯物史觀之價值而事事不惜假強暴之力。如列寧託羅斯基之於俄，不問其國是否到工業社會化的程度，乃強家庭經濟之小農以實行集產，故未有不敗者。

……以吾國今日政府的腐爛，非經一次政治上的大流血不足以更新面目洗滌心腸；未來之政治大革命又必帶社會主義的色彩，此為弟所敢預言。但菲薄民治而只知有工人專政之集產主義則非弟所敢贊同；挾片面的公道主張而欲使全社會一時之間共就其一定之範圍，直是暴君之行，必致社會瓦解。蓋此種英雄式之社會改革家多不明社會的實際與人生之複雜，而將天下事太看得簡單。故弟極願敝會同志於研究社會主義時多留意社會實際與個人生活。一種社會主義能與此二者相調劑則不難得自然的發展，否則徒使二十世紀最有希望之社會改革的主張又將為中國多數所詬病耳！……”

本來真正的社會主義與個人自由是不相衝突的，不但不相衝突，並且可以說他是為個人自由而從事的：社會主義之所以反對資本主義，就是因為資本主義足以妨害個人的自由發展，因此他才有個人的經濟解放的主張。一個德國的社會學者說得好：“沒有自由主義在中間，社會主義是不堪想像的：社會主義根本該當是自由主義的；他所含的個人解放的思想實為我們生活的存在與其發展所必需的條件。”（見 Ziegler La question sociale est une question morale）如果我們不否認這個根本的說法，我們商量社會主義的時候便該當（一）不取宗教主義的形式，（二）不假專制強迫的力量。因為這兩種手段都是與社會主義的根本思想——個人自由——相衝突的。

甚麼叫作宗教教義的形式呢？就是不問個人的志願和活動，主張一種一成不變的說法，以個人自由的志願為無足輕重，而以這種說法為各種社

會皆應取的一定趨向。現在一種強力施行的集產主義便好像柏那圖 (Platon) 的說法一樣：「城市至尊，個人至卑」；個人並不是爲個人而存在，簡直是爲社會而存在。有這種教義的想法，於是才會相信社會萬能，政府可以爲人民包辦一切，於是才有命令式的集產主義的實現。在普魯士王家正盛的時代，日爾曼民族統一的觀念非常發達。順着這個潮流，因之有康德 (Kant) 一派的個人附屬於社會的道德學說，黑智爾 (Hegel) 一派的政府萬能的議論，兼之李斯特 (List) 的國家主義的經濟政策在德國大生效果，所以德國學者倡言社會主義大都不能不趨重政府的能力；國家社會主義自不待言，即馬克斯的集產主義又何能免偏重政府權力之弊。

我不想在這裏多批評集產主義，不過要想指明馬克斯的說法是有本于德國民族性和他當時的潮流，不能認爲一種教義，隨處可以傳佈，而不問其他的民族性能容受與否。譬如以法國的民族性比較尊重個人的活動，便與馬克斯集權的說法不能相容。蒲魯東 (Proudhon) 本是馬克斯的好朋友，他也是社會主義的健者，但他在這裏便與馬克斯分離了：“他愛自由甚於他愛公道，”他與其贊成那種“暴民的，警察式的假社會主義的政治”他寧肯不要社會主義。他甚至說：“共產主義者，你藏着罷，你在我面前使我難受”

主張「狄克推多」的集產主義者口裏常說他所用的強暴的手段是暫時的，是與他的目的不相妨的。假霸道以行王道，已經不能得多數的同情，況且所謂暫時，究竟爲好多時光。如果目的地的平等公道尙離得很遠，而長久叫人暫時忍受不平等不公道，這未有不生出反感而大家解體以去的。況且集產主義者所主張的公道完全是片面的公道。因爲他着想時，只見靜的社會一面而忘却動的個人。靜的社會本是各個動的個人的志願所要求而集成成的。主張社會主義首先便該當留意到個人，個人的

生活如此其繁複，個人的願欲如此其切己！萬不是集產主義的「狄克推多」者打着平等公道的旗幟，便可以使許多個生活志願成爲一律的。

但是他們說人類自私性是很危險的。不錯，我們都知道人類自私性是很危險。但是要知自私性是人類活動的中心，只能調劑之使不足以爲惡，不能勉強壓迫之，使他不能得相當的發展。野蠻的社會，未進化的社會，社會學家所謂機械式的連帶作用(*Solidarité mécanique*)的社會便是壓迫一部份人的自私性而使其他一部份人自私性盡量發展。但是人類愈進化，分功愈繁複，彼此相需要之事既多，彼此相重視之情愈切，於是乃由機械式的連帶作用變爲自動的連帶作用(*solidarité organique*)。在今日文明的社會裏，精神的生活與物質的生活，一個人所需要的事物非常多，那能不承認構成這許多事物的各種工作的價值呢！

集產主義既趨重唯物的觀念，眼裏便只看見那工廠內田地裏弄機器的才算工作，才算勞動者。其餘勞心志，竭精神，直接的或間接的爲人類盡力者都一概以「紳士」二字抹殺之：這未免太不與哲學家，文學家，科學家，藝術家……等留餘地了！要知在社會的動的 (*dynamique*) 一面看來，用腦力爲人類謀更大更永的幸福的工作，與用體力在工廠勞動八點鐘，究竟誰的效果要大一些？前面已經說過，人類精神需要的急切繁多是與物質需要不相上下的，爲甚麼唯物觀的集產主義者只珍重別人栽白菜蘿卜而不珍重別人種芍藥牡丹呢？

唯物觀的集產主義者最鄙視的是安閒，而這些思想家藝術家却非得許多的安閒去涵泳構思不可；他們愛把價值與勞力拿來放在秤盤兩端，要比量得清清楚楚，而這些思想家藝術家的工作恰恰是一時或永久都不能比量的。法國近今一個哲學家甫野(*Fouillée*)把這個意思比擬得很好。他說：“我們究能够把精神的工作用權力來規定麼？我們能够叫雨果 (V.

Eng.) 從早七點鐘便開始作詩，或是到九點鐘便停止嗎？我們怎麼去量他的價值？天才的思想往往在經濟上沒有甚麼價值的。……當加里來（Galilée）發明木星的陪座星（satellites de jupiter）的時候，集產主義的規定價值者能夠料定他這個發明是適用於測最準的圖而免却許多商船的危險嗎？別人的安閒，以至於偷閒，在作手工的人看來是如何的可耻，但在另一面看來，還是有他的社會的需要和益處。如果衆人都曲着背去弄犁頭或機器，便不會有這些思想家，這些所謂遊手好閒的人如蘇格那底（Socrate），如亞爾西麥得（Archimède），如拉卜那斯（Laplace），更不會有如丹丁（Dante），如莎士比亞（Shakespeare），如拉馬爾丁（Lamartine）這一些人。”（見甫野的 *Le travail mental et le collectivisme matérialiste* 文中）

總結上面所說的意思，就是我們商量社會主義的時候：

- （一）不可以忘却個人生活的繁複與個人願欲的切要；
- （二）須知道精神工作的價值是與體力工作的價值一樣的重要；

因此我們採取社會主義的時候：

- （一）不宜有集產主義的唯物觀的態度，
- （二）不宜有新馬克斯派一階級專政的想法。

況且中國人歷史上的習慣——或者可以說歷史上的長處——是不假政府之力而富於個人進取。現在欲一時之間，用強力，完全使中國人的生活聽一政府支配，一政府包辦，必定會使多數驚而反走，終無所成。

總之，在原則上自由競爭（libre concurrence）之有弊害，在現狀下經濟組織之不人道，我們都是很了然的。社會革命的注目，特別在經濟的改革，使人人能獲得機會上的平等，這也是我們及身便感覺到而深表同情的。但是在達到這個改革目的的手段上，我們該當特別留意，仔細商量。

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說得好：“在目的上可以原諒手段，這個語不是真實的。在真的進步上說來，手段還比目的更重要呢。——因為目的常常不容易便達到，並且不能圓滿的達到。……至於手段或是照着正誼的步調，或是照着強暴的法則，便可以表現人的精神。”（見「少中」第三卷第十期）

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巴黎



我們的工作

王光祈

我們相信要創造『少年中國』。不是一個人或一個團體所能包辦的。所以我們主張『社會分工』。換言之。每一個人或每一個團體對於社會。都要有他的特殊工作。我們又相信要創造『少年世界』。亦不是一個民族所能包辦的。所以我們又主張『國際分工』。換言之。每一個民族對於世界。都要有他的特殊工作。因此之故。我們便不能不常常自問。『我們是幹什麼的？』『我們團體對於社會，世界。究竟分了一種什麼特殊工作？』

我們所分的特殊工作。便是下列兩種。

(一)中國農民階級改造運動

(二)亞洲弱小民族自決運動

我們何以要從事這兩種運動呢？第一。我們以為無論一種什麼完美的『主義』。皆要有一種健全的『人』，才能應用。可惜我們中國的『士農工商』。把這個『人』字的工夫都還沒有做到。現在可是好了。上海的資本階級。已經起來了。一部分之智識界外交家已與之努力聯合了。我們預料在不久期間。中國的政權要轉移到所謂『商教階級』之手了。換言之。『士商兩種人』。都有享受『人的生活』之一日了。用不着我們擔憂了。至於我們中國的工業。現在雖不發達。但是直接為中國資本家作奴隸，間接為外國資本家作牛馬，的工人。亦漸漸的不少了。現在可是好了。廣州一部分工人已經有了團結了。一部分之青年已經組有共產黨作其先驅了。我們預料所謂『人的生活』亦漸漸要輪到『工』人了。亦用不着我們擔憂了。我們眼看着，現在所被人忘却的。只有

一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的農人了。他們對於『人的生活』大概是沒有分了。但是他們却占了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這便不能不使我們擔憂了。因此之故我們不能不敬告一般資本家。你們努力發展工商。我們並不反對。但是你們不要忘記你們工商的原料。是我們農人所生產出來的。不先有我們農人。便沒有了你們工商家。我們掉過頭來又敬告一般共產黨。你們主張共產。我們並不反對。但是你們不要忘記列寧的話。『農民是共產主義的仇敵』。若有了我們農人。便沒有了你們共產黨。你們若要實現共產主義。便不可不先在我們農民身上用一番大工夫。我最愛的青年朋友們呀。我們不可不立在資本家與共產黨的中間。從事這種改造農民生活——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的預備工夫。這便是我們所以要從事第一個特殊工作的原故了。第二。我們以為無論講什麼大同主義世界主義。首先要每一個民族皆須撐得起腰來。現在有許多人高談世界主義。對於英美德法工人之不平待遇。常抱無限同情。而對於我們四週圍的弱小民族。一個個快被人壓迫死了。我們却毫不動心。法國『人道報』至今猶常常提及中國臺灣人民。代為伸訴苦況。而中國報上早已不見臺灣二字了。朝鮮革命。日本志士。尚肯從中幫助。而中國青年則只是袖手旁觀。我們真是沒有同情心的人類呀！我們既號為亞洲的文化古族。我們以人口幅員而論又負有糾合亞洲各弱小民族與世界列強對抗的天然資格。從今以後。我們再沒要高談怎麼樣幫助英美德法工人了。只是研究我們怎麼樣扶助我們四圍的弱小民族。鄉隣有難我們應該被髮纓冠而往救之。若是亞洲的弱小民族撐得起腰桿來了。那些資本主義的國家。失了殖民地勢力的憑藉。亦自然會倒了。這便是我們所以從事第二種特殊工作的原故了。

我們的工作

我們以上述兩種特殊工作自責。社會上亦以此兩種工作責我們。若能成功便是我們的『素志得償』。若不成功。則社會上亦可宣布我們罪狀。說『責有攸歸』了。

最近我們參與德國『國際青年團』時。曾在場中散布一種傳單。說明少年中國學會的旨趣。我現在把他譯錄如下。以作本文的結論。

『少年中國學會傳單』

我們的宗旨 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

我們的責任 我們以為若要實現我們的理想。須經過國際的與社會的兩種分工。

(一)國際的分工。

(a) 我們以為若欲改造全世界。則每一個民族皆須努力先自振拔。我們是中國人。所以我們負有創造少年中國之責任。因此之故。『少年中國』的意義。不是一種國家主義的。而是一種世界主義的。這是我們在國際分工中的第一種責任。

(b) 我們以為若欲使全人類皆得着幸福。則每一個民族皆負有扶助其他弱小民族脫離壓迫的責任。我們居在亞洲。所以我們負有扶助我們鄰居。如高麗、印度、安南、波斯、阿富汗、俄羅斯之類，的責任。因為他們朝夕呻吟於我們左右的原故。這是我們在國際分工中的第二種責任。

(二)社會的分工。

(a) 因為我們欲將全力應用在社會方面。所以我們不加入政府及議會。換言之。我們的運動不是政治的。而是文化的

社會的。這是我們在社會分工中的第一種責任。

(b) 中國是農業國。農民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假如我們欲改造全中國。那麼。我們第一應先改造農民。因此之故。我們一方面從事農民教育。他方面則擬組織一理想經濟之模範村。使全國受其影響。此種模範村之集合。即是我們的少年中國。這是我們在社會分工中的第二種責任。

我們的會員

因為我們不願立在任何宗教基礎之上。所以我們會內沒有佛教徒基督教徒回教徒。

因為我們不願參加現在中國政治運動。所以我們會！無官吏議員。而且我們獨立於一切政黨之外。

因為我們欲求各民族之相互了解。所以我們會員百分之六十。在外國留學或作通信記者。

因為我們欲改造農民思想。所以我們一部分會員從事農民教育。

因為我們反對一切國內國外強權。所以我們有一部分會員從事革命事業。

總而言之。我們的工作。是創造『少年中國』之預備工夫。創造『少年中國』。是創造『少年世界』之預備工夫。我們希望表同情於我們的人們。與我們共同工作。

少年中國學會駐德代表王光祈

柏林馬利杜夫街十六號

一九二二年八月一日

Die Jung-China Vereinigung

Unsere Ziel:

Schöpfung eines Jung-China durch soziale Bewegung auf Grund wissenschaftlichen Geistes.

Unsere Aufgabe:

Verwirklichung unseres Ideals durch internationale, soziale Arbeitsteilung

I. Internationale Arbeitsteilung:

a) Um die ganze Welt ideal und neu zu gestalten, muß unserer Ansicht nach jedes einzelne Volk in erster Linie an sich arbeiten. Wir sind Chinesen, daher sind wir verpflichtet, zuerst Jung-China zu schaffen. Infolgedessen ist die Bedeutung Jung-Chinas nicht national, sondern international. Das ist unsere 1. Aufgabe bei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steilung.

b) Um die ganze Menschheit glücklich zu machen, ist unserer Auffassung nach jedes einzelne Volk verpflichtet, kleine, schwache Völker vor Unterdrückung zu bewahren. Daher müssen wir Chinesen unseren Nachbarvölkern in Asien helfen, z. B. Korea, Indien, **Anam**, Persien, Afghanistan und Rußland, deren Not uns täglich jammert. Das ist unsere 2. Aufgabe bei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steilung.

II. Soziale Arbeitsteilung:

a) Weil wir mit ganzer Kraft auf dem sozialen Gebiet arbeiten wollen, halten wir uns fern von Regierung und Reichstag. Das heißt, unsere Bewegung ist nicht politisch, sondern kulturell und sozial. Dies ist unsere, 1. Aufgabe bei der sozialen Arbeitsteilung.

b) China ist ein Agrarland, 80% der Bevölkerung sind Bauern. Wollen wir also ganz China reformieren, so müssen wir zuerst die Bauern reformieren. Daher widmen wir auf der einen Seite unsere Bemühungen der Erziehung der Bauern, auf der anderen Seite sind wir bestrebt, vorbildliche Wirtschaftseinrichtungen in einem Musterdorf zu schaffen. Dieses Musterdorf soll ganz China zur Nachahmung dienen. Eine Gesamtheit von Musterdörfern bildet das Ideal unseres Jung-China. Dies ist unsere 2. Aufgabe bei der sozialen Arbeitsteilung.

Unsere Mitglieder:

Da wir nicht auf dem Boden irgend einer Religion stehen, finden sich unter unseren Mitgliedern weder Buddhisten, Christen noch Mohammedaner.

Da wir an der jetzigen, politischen Bewegung in China nicht teilnehmen, gehören unserer Vereinigung keine Beamten, keine Offiziere, keine Abgeordneten an, und wir sind unabhängig von allen politischen Parteien.

Weil wir Verständigung mit allen Ländern suchen, studieren 60% unserer Mitglieder im Ausland oder sind dort als Korrespondenten tätig.

Weil wir den Geist der Bauern reformieren wollen, ist ein Teil unserer Mitglieder mit der Erziehung der Bauern beschäftigt.

Weil wir jeder Gewaltanwendung, sei es gegen Inland oder Ausland, feindlich sind, ist ein Teil unserer Mitglieder revolutionär.

Kurz gesagt, unsere Arbeit besteht darin, die Schaffung Jung-Chinas vorzubereiten. Die Schaffung Jung-Chinas ist die Vorbereitung für die Schaffung einer neuen Welt. Wir hoffen auf die Mitarbeit derer, die mit uns sympathisieren.

Vertreter der Jung-China-Vereinigung in Deutschland

K. C. Wang,

Berlin-Steglitz, Mariendorfer Str. 16, I.

Berlin, den 1. August 1922.